

# 揭秘中国“独脚将军”的传奇经历： 二战中为何被封为“大英帝国爵士”

## 陈策宁死不当俘虏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8日，日军投入海陆空力量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英军在香港的防御力量极其微弱，只有28门大炮、6架飞机和少量小型舰艇，人员包括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部队在内共1.5万人。然而，港英当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英军能坚守香港6个月，因而没有与国民政府积极配合，致使增援香港的中国军队无法按期到达，英军陷入苦战。

战斗打响后，国民政府驻港特派军事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号召在港中国军民积极抗战。这位因追随孙中山而失去左腿的“独脚将军”，联络中国驻港各机构，成立了“中国各机关驻港临时联合办事处”，协助港英当局，维持社会秩序。可是，仅仅过了18天，英军就支撑不下去了。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接到了英国政府“放弃抵抗，向日军投降”的命令。

陈策获悉英军将要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召集中国各机构代表开会，研究对策。会上，陈策坚定地表示：“如果我援军不到，香港一旦陷落，我宁死不做日本人的俘虏，决定冒险突围。”他从口袋里取出护照，用笔写下“不成功则成仁”6个字，又分别给父母和妻子写了遗书，吩咐弟弟陈籍带回家乡。随后，他将突围决定通过电话告诉杨慕琦。杨慕琦十分赞同陈策的主张，并把仅有的5艘鱼雷艇交给了他。

下午3时，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克道格尔、助理罗斯、空军少校参谋沃克斯福德等十多名军官相继赶来，跟随陈策一起突围。另外，响应突围的还有来自陆、海、空三军的50余名英军官兵，他们乘坐5艘鱼雷艇，冲破日军封锁线，直驶鸭脷洲盟山背停泊，等待陈策的到来。其中就包括07号鱼雷艇上的艇员巴迪·哈德。一小时后，当获悉杨慕琦已去九龙向日军投降时，陈策立即下达了突围命令。

几年前，一家英国报纸刊登了海军老兵巴迪·哈德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41年圣诞之夜的惊险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海军少将陈策。多年后，这位被英国政府授予“大英帝国爵士”称号的“独脚将军”率英军突围的传奇经历，依然被人津津乐道。



“独脚将军”陈策

## 海上突围惊心动魄

12月25日下午4时，陈策率领英军军官及中方人员共10余人，前往香港仔海滨。他们登上一艘汽艇，准备驶往鸭脷洲。当天天气晴朗，海上一览无余。汽艇刚刚驶出不到半里，就被驻扎浅水湾西角的日军发现，他们用机枪猛烈扫射，之后又用小炮轰击。在猛烈的炮火中，舵手阵亡，麦克道格尔也背部中弹，陈策左手腕被打中，血流如注。更糟糕的是，汽艇主机被击坏，艇身在水面上打转，无法前行。在这危急时刻，陈策毅然下令弃船。他取下假肢，连同假肢中存放的4万港币，一同丢入海中，率先跃入大海。

在他的带领下，人们纷纷跳入海中，奋力向鸭脷洲游去。可他的副官杨全不会游泳，执意要返回香港。陈策厉声训斥道：“回香港就是投降，你不下海，我就枪毙你！”说完，他将艇上唯一的救生圈抛给了杨全。

隆冬的海水冰冷刺骨。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拼搏，他们终于登上了鸭脷洲，与先前到达的5艘鱼雷艇以及50余名英军官兵会合。

登上鸭脷洲并不意味着突围的成功，这个小岛依然在日军的射程范围内，他们必须离开这里，登上广东地界。陈策将67名官兵组成突围分队，亲自拟定登岸航线。晚上9时30分，陈策被抬上鱼雷艇，他命令5艇同时向目的地疾驶。虽然途中遭遇一艘日军驱逐舰，但陈策沉着冷静，命令5艇一字排开，径直冲向敌舰，以迷惑敌人。日舰果然误认为是盟军舰队发动攻击，仓皇逃避。午夜，5艘鱼雷艇抵达广东南澳，突围获得成功。

## 部分英军回到祖国

到达广东并不是目的，大多数英军官兵想返回自己的国家。但从中国大陆回英国，路途遥远，不仅要通过大片日军占领区，而且还要经过缅甸、印度等国家，然后才能乘船回英国。这条路可以说充满了凶险，单是走出广东，就要通过日军的层

层封锁线。

陈策找到了当地的游击队，队长叫梁永元，曾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也是陈策的老部下。梁永元二话没说，决定给突围分队以最大的帮助。几小时之后，突围分队踏上了漫漫征程。

12月29日，突围分队到达惠州，这里已经是中国军队的控制区。5天后，他们到达龙川，2天后又到达韶关。

此时，陈策率英军突围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媒体纷纷报道。在韶关，突围分队受到当地军队的热情欢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亲自前往迎接。这时，陈策受伤的左腕已经感染，必须手术治疗，无法随分队继续行动。

在随后的日子里，突围分队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先后经柳州、贵阳、昆明，通过滇缅公路到达腊戍。然后从腊戍经眉苗、曼德勒，到达仰光。

1942年3月8日，突围分队乘“海瑞奇·杰森”号商船离开了仰光，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通过陆路穿越印度大陆到孟买。4月28日，分队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船只。

就这样，在突围出香港岛的67名中英人员中，英军除部分人员自愿留在中国工作外，其余有3名军官、28名士兵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后来，巴迪·哈德与他家乡的一位姑娘结了婚。

“独脚将军”率英军突围的事迹很快在欧洲传开。1942年2月，伤愈的陈策飞抵重庆，受到各界的欢迎。国民政府授予他二等勋章，行政院授予他海军中将军衔。英国大使馆代表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大英帝国爵士”称号，并将他接到印度，专门制作了假肢。

后来，陈策把左腕中取出的那颗子弹镶嵌在一条金链上，佩带在胸前，作为他从香港突围的永久纪念。1949年8月，陈策因病在广州去世，享年57岁。

(据《世界新闻报》)

# 名画《溪岸图》：何以引发长达15年的辩论

## 《溪岸图》：

### 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

上世纪30年代，画家徐悲鸿忽然声称自己觅得了古画《溪岸图》，不久之后他将画转让给了张大千。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在采访中还原了这段历史：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购得一幅署名董元的巨幅古画《水村图》，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会面，见之爱不释手，遂带回四川研究。几年后，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喜欢的金衣《风雨归舟》(有人认此画系张大千伪作)，换得此画。1957年，鉴藏家谢稚柳将此画公开，并审定其名为《溪岸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并请东京著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骝千出巨资购得此画，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蒙娜丽莎》。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称《溪岸图》为仿制赝品，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观点：“这不可能是幅10世纪作品……其作者应是伪作者与收藏家张大千。”

美国人高居翰是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权威之一。以高居翰的地位，此论一出舆论哗然。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学者，然而大家并未达成共识。

高居翰是“伪作说”的代表人物。在展览的论文集里，他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坚信，这根本不是一张古画，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溪岸图》的风格特征和其他署名张大千的画作是如此一致，在真正的古画中不会得见，这才是判断问题的关键。”高居翰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

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像董元(亦作“董源”)的《溪岸图》那样，会引发一场长达15年的艺术界国际性大辩论。十几年前，围绕董元《溪岸图》是真迹还是张大千伪作，曾引起一场国际的大辩论。近日，“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来自美国大都会的藏品、中国五代南唐画家董元的《溪岸图》首次在国内展出亮相，谢稚柳的夫人、著名书画家和书画鉴定家陈佩秋指出，《溪岸图》是董元的唯一传世真迹。而以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权威之一美国人高居翰为代表的“伪作说”则认为，“我坚信，这根本不是一张古画，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

之作”。

持“伪作说”观点的还包括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

## 大师的临摹之功

### 从“师古”开始，到以心为师

临摹是学习书画的一种训练方法，如果说有临摹大师的话，倒不如说有训练(练习)大师。然而，临摹大师是有的，张大千就是。

张大千学画时，非常重视临摹古画，他强调，“师古人之迹，先师古人之心。”(摘自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

青年时期的张大千，有一次在对街裱画店里看到清朝画家张大风的一幅人物，寤寐难忘，一连跑了十几趟，将张大风的人物临摹下来。因为酷爱张大风，还将画室命名为“大风堂”。

画家成忠臣在其作品《艺术大师张大千》中说，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和绘画风格，经



董元(亦作“董源”)的《溪岸图》

历“师古”、“师自然”、“师心”三个阶段：40岁前“以古人为师”，40岁至60岁之间以自然为师，60岁后以心为师。早年遍临古代大师名迹，从石涛、“八大”到徐渭、郭淳以至宋元诸家、敦煌壁画。60岁后在传统笔墨基础上，受西方现代绘画抽象表现主义的启发，独创泼彩画法，那种墨彩辉映的效果使他的绘画艺术在深厚的古典艺术底蕴中独具气息。

## 仿作超越真迹

### 徐悲鸿赞“五百年来一大千”

“临摹超越原作的事情，从古至今的艺术史中，例子都不胜枚举。张大千如此，他之前的古人也是如此，就算是现如今，还是能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四川博物馆副馆长魏学峰告诉记者，临摹超越原作，的确是艺术史上的常态。

张大千临摹得最多的还是石涛。他对石涛深学精研，仿笔法，能乱真。时至今日，不少张大千仿石涛的画作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尽管张大千的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也较光滑，但是，就连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画家朋友也难辨真伪，曾衍生出许多笑谈佳话。石涛的赝品流传于世是较多的，但出自张大千手中的赝品已成珍品，或者说是超越真品的珍品。

张大千尽管以临摹石涛著称，事实上又不至于石涛一家，还泛涉众家。

他从清代石涛起笔，进而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然而他对这些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艺术学习，尤其是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画风，完全地舍去了原有的格调。

与古代名家的真迹比较，许多张大千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已被公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大茂林叠嶂图》等。

徐悲鸿在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大千画集》的序言中，赞誉其为“五百年来一大千”；齐白石评价其为“一笔一画，无不意在笔先，神与古会”；张大千晚年与毕加索结交，互表钦慕，人称“东张西毕”。

(据《成都商报》文/向晨晨)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